



葛剑雄 主编

当代学人精品

茅海建卷

茅海建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 主编

当代学人精品

茅海建卷

茅海建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 / 茅海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218 - 10781 - 3

I. ①当… II. ①茅…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文集 ③外交史—中国—近现代—文集 IV. ①C53
②D69 - 53 ③D8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369 号

DANGDAI XUEREN JINGPIN · MAOHAIJIAN JUAN

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

茅海建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段太彬 刘奎

技术编辑: 梁茵

封面设计: 邓晓童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总 序

我不时会到高校或公共场所作讲座，主持人作介绍时，往往会给我加上“央视《百家讲坛》讲师”，有时还特别强调“与某某一样上过央视《百家讲坛》”，而听众会报以更热烈的掌声，大学生也是如此。这提醒我，在大学生的心目中，“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的影响远不如“百家讲坛讲师”，某某等就是凭借在央视的频频出镜，一跃成为“最著名”的学者，甚至成了国学大师。我之所以感到意外和困惑，还因为我除了在《百家讲坛》讲过五次外，早期还参与过一些策划，知道当初收视率调查的结果是“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因此制片人对讲者一再强调要通俗，“多讲故事”。在我讲的那几次录制现场，听众大多是老人，少数年轻人也不像是大学生，证明调查结果大致正确。看来当今的社会，电视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书籍和其他媒体，以至连大学生和知识界的年轻一代都更看重电视的影响，而不是实际的研究水平、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不过，对这两种现象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如果学术和学者在大学和社会的影响的确过高了，我们就应该平静地接受这样的变化。反之，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转变使学术和学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就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使学者的学术成果能为更多的受众所了解和理解。当然不能要求学者们都到《百家讲坛》去讲故事，也不是所有的成果都适合介绍给“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观众，但将大部分

研究成果写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些还是应该的，至少要让非本专业的学术界同行和有志于学术的大学生能看得懂或有读下去的兴趣。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学者有代表性的或最新成果的汇编出版，为学术界、年轻一代和社会各界提供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精品出版物。而现在出版物太多，网络信息泛滥，鱼龙混杂，甚至真伪莫辨，对学术刊物等级的盲目追求，又使那些未在“顶级刊物”或 SCI、CSCI 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忽略，有时甚至连专业内同行也未能注意。

正因为如此，当向继东兄邀我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一套《当代学人精品丛书》时，我欣然应命，希望能利用这一良机，让学界同仁的精品力作能比较及时又相对集中地与关注他们的读者见面，也希望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当代学人的最新成果。

人们常常感叹当代缺乏大师，其实今天被称为大师的前人在当时大多也还没有被当作大师，真正的大师需要经历科学、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

为了使这套书有更多的读者，我曾请求作者尽量选录自己的最新成果，并在同类主题中尽可能更具可读性的作品。但同时我也希望读者能多一点信心和耐心，对高水平的论著有点看不懂、不理解，是很正常的；经过努力读懂了，理解了，自己就进步了，提高了。如果一直只看完全读得懂的文字，尽管轻松愉快，却只能原地踏步，至多只是量的积累。

本丛书的作者，一部分是我熟悉的，一部分是继东兄和其他友人推荐的。如有选择不当，自应由我负责。每一种书的具体内容，均由作者自己选定。

葛剑雄

2015 年 7 月 9 日



茅海建

1954 年出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时，读小学五年级，随后参加“革命”“学工”和“学农”；16 岁去当兵（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23 岁上大学（1977—1980，中山大学历史系），属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26 岁读硕士研究生（1980—1982，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编辑《百科全书》；1989 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读书仅 10 年，军龄却有 19 年。

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 10 年，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 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8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的课题有两项：

从 1980 年读研究生时起，主要研究两次鸦片战争及该时段的政治与外交，用了 18 年的时间，先后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訢》（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该项研究已经结束。

从1998年起，主要研究戊戌变法，已经用了17年的时间，先后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该项研究尚未结束，仍在进行中。

另著有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年）。

目 录

Contents

史事	1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	3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3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12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41
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87
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115
六、整肃与软禁	143
七、结论	167
附录一：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169
附录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 重要折片	186
补记	190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 阅读报告	194
一、手稿本的基本情况	195
二、抄本的流传及刊行	203
三、书名、卷数与写作时间	211
四、手稿本的修改与增添	219

五、光绪十五年之误记	231
六、初步的结论与愿望	235

戊戌变法前后诸政事	237
一、光绪十九年刘坤一查办张之洞	237
二、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起用容闳	244
三、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的“妙法”	262
四、光绪二十二年查验刘鹗的假资产证明	280
五、光绪二十二年为李鸿藻治病	291
六、光绪二十四年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	303
七、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香港谈话、来信及“密诏”在上海发表与 张之洞等人对此的反应	319
八、光绪二十六、七年策反邱菽园	331
九、光绪二十七年请奖梁庆桂等人赴西安报效事	351
十、光绪二十七年请废大阿哥	356

公使驻京本末	365
一、“公使驻京”之由来	365
二、《天津条约》的签订及对“公使驻京”的规定	372
三、全免关税与修改条约	385
四、俄国使节、美国公使在北京	393
五、西礼觐见的威慑力量	403
六、普鲁士等国条约的范式	415
七、西礼觐见的实现	428
八、简短的结语	442



三元里抗英史实辨正	445
一、起因：英军的暴行	445
二、中英文献记载及其差异	446
三、英军撤退的原因	451
四、传说流传的原因	454
五、抗英民众的身份	457

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	460
一、南京条约及其之后的交涉	460
二、四项重大权益的丧失	464
三、“一视同仁”的原则	473
四、简短的结语	476

随笔	479
陈旭麓先生忌日十周年	481
在越南的学术访问	488
在板门店	502

征引文献	516
茅海建小传	530

CHAPTER I

史 事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 ——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文艺家的欣赏，由其加之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又到处让历史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理由，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但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①

一、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日^②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了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人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③ 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二、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

① 此处所提的学术史是指职业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为目的作品，以别于当时人或当事人的各种著述。

② 此处的“六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898年9月21日，由于当时的文献及有关研究大多使用中国纪年且又需要大量引用，为避免反复注记，故本文使用中国纪年，并夹注公元。

③ 该年谱长编最初发表于1936年，其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编者署名为丁文江。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的修订本，改名《梁启超年谱长编》。据该书由赵丰田所撰“前言”称，当时的主要编写工作由赵丰田操持，此说又由顾颉刚所撰“序”为证。我引用的是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并与1936年油印本核对），见该书第143页、第149页。



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意义。^①

三、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他通过对梁氏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修改之用意在于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的失误。^②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③

四、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花》。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

① 《学术季刊》（台北），第4卷第3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近代史事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8年，第1册，第123—150页。事隔40年后，吴先生再写《戊戌政变时的袁世凯》（《历史月刊》台北，1998年6月号），再次重申其先前的论点。

② 《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0月），本文作者所据是其于1964年改定本，并收入其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文星书店，1964年。

③ 《幼狮学志》第2卷第1期（1963年1月），此处据其1964年改定本，见《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39—189页。

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① 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训政，并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②

五、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以挖掘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有为皆有改窜。^③ 黄先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巅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生多有重复。

① 《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10月。

② 《文星》第77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91—230页。

③ 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其中《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一文，其注为1967年5月初稿，1969年5月二稿；《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一文，其注为1969年5月完成。关于调袁军入京挖掘窖金事，黄先生1988年发表《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先生》（《大陆杂志》第77卷第5期），称其已看到孔祥吉的论文《杨深秀考论》，但仍坚持其旧见。



六、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当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① 周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对此事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七、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光绪帝之心。而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午令捉捕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② 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篇全面之作，惜在《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八、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引用《卓钦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居注》，证明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册》为“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③ 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④

九、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

① 《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该文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83页。

③ 《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④ 《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